

# 澳大利亚的历史地理研究

D. N. Jeans

澳大利亚有人类居住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五万年前,从欧洲人进入算起也有两百年。毋庸置疑,土著居民有着以宗教解释土地为特征的本身的地理,他们通过刀耕火种来改变自然景观和影响动物区系。欧洲人居住澳大利亚后,在相对短的时期使这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把工业革命的动力强加于这块土地,根据全球经济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选出合宜的地域进行开发。城市网和运输系统增强了澳大利亚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纽带。如此众多变化不息的事件对为数不多可以从事其研究的历史地理学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澳大利亚每个地理学系只聘请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因此这个工作必须持续许多年。

现代统一地理学的先驱们,泰勒(Taylor),麦克冬耐多(Mascdonald)、霍姆斯(Holmes)以及安德鲁斯(Andrews)并未完全忽视历史地理学,然而历史地理学的新阶段始于五十年代史培特(Spate)从伦敦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此间梅宁(Meinig)以个人的努力促进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1962年研究了南澳大利亚的小麦区。随之而来的是佩里(Perry)关于早期新南威尔士政区的研究,希思科特(Heathcote)把“适宜价值(Opportune use)”的概念应用于瓦若沟(Warrego)区半干旱草原地带,他们俩人都是史培特的学生。其他移居国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回来了,出现了一大批专题研究。鲍威尔(Powell)研究了西维多利亚州的基础资料和意识形态,吉恩斯追溯了新南威尔士农业区的演变,威廉斯(Williams)在1974年把达比景观公式,经过一些修正后应用于南澳大利亚。

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定期刊物,1975年出版了历史地理论文集,内容包括聚落、土地资源调查、城市发展和环境管理。在这一时期,史培特的兴趣从对澳大利亚的研究转移到对太平洋的研究,他已经出版了两卷本的太平洋地区历史地理。《庆祝文集(Fest schrift)》体现了他对澳大利亚地理学的贡献。其中代表历史地理的作品是北部边界的巴俄(Bauer)和瑞木(Rimmer)交通的发展。

尽管有许多作品问世,历史地理学家的兴趣一直介于大部分的人文地理学家之间。人文地理学家集中于“相关性”(relevance)研究,并采取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方式态度。一些现代的地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增加了历史的尺度,历史地理学家则趋向于对人文地理学和人类生活方式采用更为普遍的观点。历史学家除与历史地理学家个人的接触交流而外,并未受到历史地理学在更大程度上的吸引。某些历史学家已经对环境和空间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一些区域史学家对环境问题有远见卓识,也有的历史学者在编写区域史却拒绝考察所描述的区域。

从1986—87出版的通力合作的《二百年史》巨著中,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眼内历史地理学的地位,只有两位历史地理学家参与编写,巨著中仅有五薄卷描述历史时期的澳大利亚。历史地理学家被给予澳大利亚人的称号,他们编制历史地图集(地理确实是关于地图的工作),编写和编辑部分地名词典及澳大利亚的书目文献。空间、环境和社会并未在大多数历史学家中形成体系。《二百年史》的副产品是澳大利亚历史地理学简报,包括几年来关于历史地图集的研究内容和由此引深的多方面专门研究,如《西班牙流感传播》《板球队员出生地考》等。

这里柯罗(Cloher)批评了《二百年史》主卷中采用的源自历史地理学的分期方法。

历史地图集是第一次揭示澳大利亚基本空间模式的主要成就。重视地理的历史变迁的可能性也在麦卡斯基尔(Mc Caskill)的南澳大利亚地图中得到印证。上述成功展示了历史地理学家的一些有限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和地理并未象法国安娜尔(Annales)研究院那样目标一致,融为一体。

历史的和现代的人文地理学家并未找到宽广的共同研究领域,尽管他们都集中研究澳大利亚,只有极少数几个历史地理学家近年研究的范围超出澳大利亚。

**主题** 过去十年的研究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对土著史的研究转移到其他方面,研究工作大量地被限制在欧洲人占领澳洲这一时期,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发现与探索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领域如在海岸带发现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内陆的发现史在某些地区仍有争议,魏伯斯特(Webster)对里彻哈特(Leichhardt)的研究或许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可以列出限定探索内容的大纲,探索者的动机和感性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在澳大利亚,探索研究促进了系统地理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帕威尔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他逐个研究著名学者如高德(Goyer)、冯·莫利(Von Mueller)、A. G. 蒲赖斯(A. Grenfell Price)和J. M. 霍姆斯(J. Macdonald Holmes)。过去的地理学家并不专搞研究,他们积极地帮助公众了解奇异现象,探索未知的地方。有时会因公众不理解而遭受诬蔑,例如G. 泰洛(Griffith Taylor),有的被公认为取得了成就,例如M. 霍姆斯的工作(Macdonald Holmes)。

乡村殖民史的研究集中于对主要区的调查,从面上的环境和聚落普查到寻求模型,进行地方的和区域的研究。有关起源问题仍在探索之中,凯麦隆(Cameron)对西澳大利亚的研究,提出了研究殖民过程中内在因素的新方法和经济发展中的宿命论的问题。他在1985年已经转而开始研究北澳大利亚聚落的起源。殖民化在澳大利亚就是有计划的文化景观的输入。金德(Kinda)近年在吉恩斯和威廉姆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凯模(Camm)的论著可以作为该课题深入发展的代表,他研究了女王土地(Queensland)上乡村工业、农业、小麦增产、冻牛肉贸易等专题。罗宾逊(Robinson)1976年研究了新南威尔士内陆土地小麦区界限的变迁,帕威尔普查了维多利亚州的乡村工业,最具综合性的著作大概要推希思克关于战后工业的研究。

当州一级的起源研究进入中间阶段时,只能从地方研究的成果中获取信息再深入研究,即由点推广到面的方法。这些推论现在多数已被证实。这种做法目前使得资料显得分散零乱,但它却揭示出许多数据的价值。伯特立(Birtles)证明了居民如何残蚀热带雨林。考准同(Codrington)和利格(Legg)进行了局部的重要乳制品区的研究,凯模则集中注意大林顿(Darling Downs)的独特发展。门若(Menzies)研究了南澳大利亚的灌溉区,麦克奎屯(Mc Quilton)和辛格(Singer)证明了小范围研究项目的极大可能性,这些小范围研究项目要全部完成需很长的时间。同时有不少新技术的介绍和引进,即使定量方法,虽被长期轻视,也进入地理学的分支科学。客观存在着大量的可能获得的数据,尽管历史地理学家对其中大部分可以怀疑其真实性。乡村技术是一个需要继续花大力气探索的领域,地方的发掘物和外来进口物品也值得注意,在对殖民区研究方面,历史地理学家已经导致了一场革命,因为在历史地理学家参与这一研究之前,其主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条例和立法。尽管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研究立法来探索包含在其中的乌托邦式和阶级的概念。

历史地理学最新的发展是城市历史地理。澳大利亚的城市史和人文地理学对城市的偏重

是有力的促进因素。悉尼有一个悉尼史学组,主席是历史地理学家艾普林(Aplin),这个学组由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组成。澳大利亚城市化过程的初期和高速发展期依然是争论的议题,但单个城市的研究则越来越多。艾普林确认殖民时代的澳洲都市是重商主义的城市,类似蓬勃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城市斯兆伯(Sjoberg)万斯(Vance)的初期阶段,并分析了它们的空间结构。索罗门(Solomon)总结了赫伯特城的发展形态。伯特立(Birtles)一直在研究堪培拉的发展演变,尽管费彻(Fischer)早已抓住了民族资本状况的系统内容。达里(Daly)集中注意于城市的扩展和资本的流向,艾普林则进行了郊区的研究。在悉尼,梅若(Muir)研究了十九世纪的堪特堡(Canterbury);普拉斯(Pluss)写出了关于斯多斯菲尔德(Strathfield)的论著。在墨尔本,尼尔(Neal)考察了普兰(Prahran)。在波思(Perth),沙屋(Shaw)论证了福瑞曼托(Fremantle)外港,卡尔森(Curson)进行了地形学研究。哈维(Harvey)的新作《资本的城市化》、《意识与城市体验》为未来的工作提供了框图。它涉及空间、时间、资本和意识,比澳大利亚地理学家研究现代城市用过的资料更有参考价值。

对于乡镇史的研究,吉思斯和威廉姆研究了早期的规划,伯立(Burnley)与哈特哥(Hartig)正在研究这一主题,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对滞后。在维多利亚有对玛伯利(Maryborough)和多兰盖特(Tallangatta)的研究。

研究制造业的重要论著有林哥(Linge)《工业的警告》。这是一部多卷本的著作,阐述了从1788—1890年制造业的发展,证实了1860年后其能动创造性的出现和其巨大的增长,澳大利亚有为数不多的特殊工业城市,菲力普(Phillips)研究了其中之一——新城堡(New Castle)。有几个相类似的关于运输发展的研究。梅宁和吉恩斯研究了铁路网络,麦克耐多(McKinnight)研究了澳大利亚骆驼的使用和股票路线(Stock routes);瑞木(Rimmer)1975年出版的著作主要是关于近现代运输的研究,它也涉猎过去并揭示了在经济决定下的社会价值。梅若研究了堪特堡的郊区,指出城市的扩展对决定城市铁路线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扩张的研究将继续是澳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谁?获得了什么?”是很有价值的议题。

直到十九世纪的末期,人口增长因素中的自然增长才超过了机械增长,历史人口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凯模研究了作为人口研究基础的人口统计,斯特维生(Stevenson)绘出了南澳大利亚的人口迁徙图;帕威尔绘制了1861—1891年间澳大利亚历史人口地图,这是人口迅速变化的时期。凯模把人口迁徙当成一个过程进行研究,追溯英国的兴起和殖民地对移民劳动力的需要。大多数移民是英国人,但是移民的支流却有他们特殊的地理,例如悉尼的东欧犹太人;西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南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威廉姆研究了十九世纪移居澳大利亚的非英国移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爱尔兰人的研究,尽管在澳大利亚历史地图集中他们是主要的非英语移民部分。同时关于妇女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被完全忽略。

一些非英语移民集团与特殊的景观因素有关,例如中国的墓地与寺院。巴罗萨谷地(Barossa Valley)的德国村落。对景观研究还没有长足的发展,有关英国的议题则已基本完成。希思可编写《世界景观系列》中的澳大利亚部分,采用了大量历史学的方法。《户外博物馆(Open Air Museum)》一书中描写了新南威尔士文化景观的变迁。近年出版了澳大利亚景观学史方面的专题研究。两个景观剖面,一个反映在澳历史地图中,另一个是希思可分析的南澳大利亚乡村的变化。近年研究南澳大利亚景观演替采用了更多的生态学的观点,比威廉姆早期的著作前进了一步。

近年来对景观的研究源自历史保护的需要。因为现在澳大利亚的工业正处于鼎盛时期。议题之一是旅游对历史建筑物的潜在威胁,许多城市和乡镇都具有历史建筑和其它历史遗产。

悉尼的历史地理学与历史考古学有着系际间的共同课程。应用地理学的方法进行考古学的解释。帕威尔在维多利亚积极从事历史保护。学者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他有可能因阶级的偏见对保护运动的某些方面持怀疑态度。合宜的反应大概是去研究保护运动而不是积极参加其中。事实上这一运动已使澳洲景观富有生机并走向良性循环。

更为明了的是,历史地理学家在保护人文环境这一学术主题中起主导作用,人文地理学家的经济主义的几何图形学说已被摒弃。希思可和帕威尔都写了澳环境管理史的著作。帕威尔总结其为:缺少民主参与;缺少令人信赖的管理机构和经费。近年来有地理学家参与的,为环境保护而开展的民主运动才是公正的。一般说来,对其领导来说,这个运动将是长期的。一位时政评论家在联邦竞选中围绕保护这个主题为工党争取8个议员席位做出了贡献。帕威尔和希思可花费了大量心血,一直专心于澳洲半干旱土地的管理研究。费里(Frawley)研究了女王土地热带雨林的管理经营史。马乃世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拉哥(Lugg)则集中于澳东南部的森林管理研究。在澳洲,早期单纯的环境观点迅速为帝国主义的贪婪所替代。历史的回顾,例如梅宁的工作,可能会引起反醒。历史的实例不应当是过时的理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澳的环境利用一直是通过试错的实践而不是科学的指导。历史地理学家想步G.泰洛(Griffith Taylor)的后尘,再次成为活动家。

**前 景** 由于学术水平参差不齐,选取研究主题或者富有创新,或者囿于传统,以及易受历史地理学之外的其它方面的压力或吸引,所有历史地理学著作的动机和体裁多种多样。起初,澳历史地理学者大部分是理想主义者,集中于对历史著名人物的动机、理论的分析。在单个的著作中发展线索是统一的;但整体来看并非如此,除非有人把每一个体的研究看成是尚未设计的大厦中的一块砖料。过去曾经试图通过新领域理论(Frontier theories)或主题理论来达到统一,但是没有成功。历史地理学家一直作为局外人物,孤立地去进行实证,进行限定性及可能性、和对人文地理学信奉的相关论的研究。

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体系理论的出现使历史地理学的协调发展成为可能。这个理论是由瓦里斯顿(Wallerstein)和其他学者提出的。当这一假设应用于正在经历结构变化的现代功能系统时,瓦里斯顿的著作中出现了占重要地位的历史尺度,这与哈维引伸的新方法完全吻合。哈维认识到任何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现存位置以它的过去为条件,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铺平了道路,迫使现代人文地理学家跟随其前进。同时,世界体系理论为历史地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综合的方法,并避免新领域理论和主题理论的决定论成份,允许每一个国家中有因具体条件促成的发展。达里研究澳人口增长和资本增加时证明了这一方法。该方法可以从城市景观研究推广到乡村景观研究,以及应用于社会历史地理学。早期的研究成果可以进行再加工使其适应新的框架;林哥关于制造业的数据可以被用来检查瓦特斯頓关于工业梯级转移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极核(中心区)把获利较少的工业排挤到次一级地区,就象澳大利亚的现状一样。戴奴(Denoon)证明南半球国家的白人公司已经进入世界体系。

按照这一方式,通过世界体系理论的框架,历史地理学者可以与现代地理学密切联结进行二十世纪的研究。希思可已经以为畜牧工业地理是一个暂存的个体。帕威尔已经果断地把历史地理学从1880年推进到当代。瑞安(Ryan)认为政府对乡村事务的介入一直从十九世纪持续到二十世纪。帕威尔关于军事区(Soldier settlement),凯模关于大萧条;吉恩斯关于三十年代乡村地区的研究,标志着二十世纪的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的分界已互相重叠。林哥研究的1945年以来变化着的职业结构即为一例。这里还要提及,历史地理学的孤立状态也许进入尾声。真正的和谐将是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扩展他们的数据来源,而在(下转第65页)

致富营养化),造成天然水水质下降。尽管这种形势很严峻,但直到目前为止,对磷的大范围迁移和变化过程,特别是磷从陆地向水生态系统中的迁移研究的甚少。如何使磷肥应用达到最大效果,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极小,这是个尚未解决的一大难题,要求对磷的循环作进一步的研究,并探讨控制磷循环的途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环境问题专门委员会通过了研究新方案的决议,目的在于研究磷的全球性循环,作为对以前完成的氮、碳和硫循环研究的继篇。

美国的C.列文博士的报告《借助生物工程学改变生态系统的过程》极为有意义,因为我不是这方

面的专家不能妄加评论,但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遗传工程学的蓬勃发展势必提出许多重大的生态学问题。

总之,在环境问题专门委员会第八届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总的来讲科学水平是很高的。这些报告包括了生物圈和生态研究中的大部分重要研究方向。看来,科学规划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几乎没有论证自然系统综合观测系统的报告。最大的缺点是忽视了利用遥感方法所取得的环境信息以及遥感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

跃辉摘译自《Изв. ВГО》1988, № 6

(上接第35页)这方面历史地理学者一直是甚为用功的。商业指南(Business directories)、检查官员的计划和国会文件中的地图都被作为信息源泉而被深入研究。由于我们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口述的历史也就变得有相对意义。艾普林的论点赞成使用视听证据,并把它应用于对悉尼港口的研究。除此以外,学者更重视探索流通范围小的信息源,如绘画、小说、旅行帐户、电影等。这些数据似乎有些“水份”,但奥斯克·蒙哥斯頓(Oskae Morgenstein)很早就证明了其中毋容置疑地含有众多可信的数据。

大概历史地理学真正的前景是做为澳人文地理学的源泉。我们比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更多的人文主义,更多的文化内容。我们提出一种观点可以摆脱现代地理学者对社会的表面研究,促使其进入深层研究。例如麦克奎屯(Mc Quilton)的社会障碍论;权力的想像;福林栋(Freestone)对澳花园城市运动的研究;希恩可的感知研究以及吉恩斯对社会本质作用的分析等都是这一观点的体现。大概现在正是重新翻开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an. Humboldt)的巨著《宇宙》(Kosmos)去发现地理应该是什么,它反对狭窄的政治经济学说。

受马克思十九世纪理论和其衍生理论的影响,按照二十世纪的观点,历史地理学家或许贯穿于澳人文地理学。这并不是贬低早期的世界体系理论做为一种合适的综合性方法,而是要声明我们应该知道怀特赫得(Whitehead)统一体(entity)的概念;德·查丁(de. chardin)的非球体(noosphere)的设想,哈佐(Husserl)师从斯塔哥伯(Spiegelberg)得出具有合乎理性方法论的现象学,以及道格拉斯(Douglas)的人与自然的观念。符号学可为发现过去和现在景观的意义提供工具。福迦特(Foucault)和同仁(Touraine)的理论也占有一席之地,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义的现代地理学家将绝不会发现,更不用说去搞像塔福日(Tafari)这样现代城市景观的分析。大量的本世界的见解被现代人文地理学家忽略。他们的关闭的心理状态应该通过与折衷的、想象力丰富的、内容广泛的历史地理学的接触而重新开放——面向二十世纪。

参考文献(略)

赵中枢译自《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第26卷。1988年